

呂成龍 著

中國古陶瓦款識

朱家溍題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陶瓷款识 / 吕成龙著 . -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3.7
ISBN 7-80047-432-1

I . 中… II . 吕… III . 古代陶瓷 - 款题 - 鉴赏 -
中国 IV .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473 号

中国古陶瓷款识

吕成龙 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内)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5.75 插页 14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1-4500 册

ISBN 7-80047-432-1/K · 199

定价：20.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目 录
陶瓷款识和分类	(3)	
纪年款	(4)	
早期纪年款	(5)	
秦、汉纪年款	(5)	
三国纪年款	(7)	
两晋南北朝纪年款	(8)	
唐、五代纪年款	(8)	
宋代纪年款	(12)	
辽代纪年款	(15)	
西夏纪年款	(15)	
金代纪年款	(16)	
元代纪年款	(18)	
明代纪年款	(21)	
明洪武年款	(22)	
明建文年款	(22)	
明永乐年款	(23)	
明宣德年款	(26)	
明正统、景泰、天顺年款	(30)	
明成化年款	(32)	
明弘治年款	(35)	
明正德年款	(36)	

明嘉靖年款	(37)
明隆庆年款	(39)
明万历年款	(40)
明天启年款	(41)
明崇祯年款	(42)
大明年制、大明年造款	(43)
明代干支纪年款	(43)
南明年款	(44)
清代纪年款	(45)
清顺治年款	(45)
清康熙年款	(46)
清雍正年款	(50)
清乾隆年款	(54)
清嘉庆年款	(57)
清道光年款	(57)
清咸丰年款	(58)
清同治年款	(59)
清光绪年款	(60)
清宣统年款	(61)
大清年制款	(62)
清代干支纪年款	(62)
民国纪年款	(63)
室名款	(65)
宋元室名款	(66)
明代室名款	(67)
清顺治室名款	(67)
清康熙室名款	(67)
清雍正室名款	(69)

清乾隆室名款	(70)
清嘉庆室名款	(71)
清道光室名款	(71)
清同治室名款	(72)
清光绪室名款	(72)
清宣统室名款	(73)
民国室名款	(73)
居仁堂制款	(74)
明、清王府款	(74)
吉言赞颂款	(76)
明代以前的吉言赞颂款	(76)
明代吉言赞颂款	(77)
清代吉言赞颂款	(79)
花样款	(82)
明代花样款	(83)
清代花样款	(83)
供养款	(86)
明以前的供养款	(86)
明代供养款	(89)
清代供养款	(91)
仿写款	(94)
明成化仿写款	(95)
明正德仿写款	(95)
明嘉靖仿写款	(95)
明隆庆、万历仿写款	(96)
明天启仿写款	(97)
明崇祯仿写款	(97)
清康熙仿写款	(98)

清雍正仿写款	(99)
清乾隆仿写款	(101)
晚清仿写款	(101)
民国仿写款	(101)
现代仿写款	(104)
陶人款	(107)
早期陶人款	(107)
唐代陶人款	(109)
宋代陶人款	(110)
宋代磁州窑系陶人款	(110)
宋代吉州窑陶人款	(110)
宋代景德镇窑陶人款	(111)
宋代德化窑陶人款	(112)
宋代其他窑陶人款	(112)
辽、金、元代陶人款	(114)
明代陶人款	(116)
清代陶人款	(117)
民国陶人款	(119)
明、清紫砂陶人款	(120)
其他款	(125)
“天”字款	(125)
“官”、“新官”、“官样”款	(126)
钧窑数目字款	(130)
“供御”与“进益”款	(131)
“花盒”、“油盒”、“镜盒”款	(132)
“盈”字与“翰林”款	(133)
“会稽”款	(136)
“尚食局”与“尚药局”款	(136)

“五王府”与“易定”款	(137)
“仁和馆”与“太平馆”款	(137)
西夏文款	(139)
元代卵白釉瓷器款	(139)
“使司帅府公用”款	(141)
八思巴文款	(141)
“贡局”款	(142)
“显德年制”款	(143)
“宣州官窑”款	(143)
“天威军官瓶”款	(144)
“永”字款	(145)
“正八”款	(145)
图片目录	(147)
主要参考书目	(159)
附录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163)

前　　言

款识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特别是纪年款，它不仅是古陶瓷断代的主要依据，而且是鉴定真赝时可供参考的主要方面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仿古瓷器大量出现，这些仿古瓷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比以往更加注重款识的仿写，笔法乱真者，常使人误入彀中。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对中国古陶瓷款识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以便把握好从款识鉴定古陶瓷这一关。

近几年，笔者在古陶瓷鉴定班授课过程中，常有学员建议我编写一本专门的关于中国古陶瓷款识方面的书。为此，笔者在广泛查阅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是书，以满足古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需求。

本书在编写体例上采取先分类再按时代顺序叙述的方式，使用颇为方便，编排力求紧凑醒目，文字表达力求深入浅出。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将所有的参考文献都穿插在行文的括号里。所附图片也采用当今颇受人们欢迎的“图随文走”的形式，使人能够一目了然。

由于中国古陶瓷款识学问深奥，涉及的学科也颇为广泛，其中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本人也正在继续探索。因此，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不吝赐正。

作者

2002年6月

陶瓷款识和分类

款识又称“铭文”，本指古代钟、鼎等青铜彝器上铸刻的文字。“识”在这里读 Zhi，与“志”同音。东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志第五下“郊祀”条）载：“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唐代颜师古《汉书注》曰：“款，刻也；识，记也。”明代方以智撰写的训诂书《通雅》对款识有三种解释：（1）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文凸出者。（2）就器物内外而言，款在外，识在内。（3）花纹为款，篆刻为识。实际上，在后人眼里，款识已失去其本意，款与识的界限也很模糊，人们将款识引申为书画、陶瓷、玉器、漆器、竹木牙雕等文物上的题铭或文字。就陶瓷而言，凡在陶瓷器上以刻、划、印、写等不同方法，记载制作该器的时间、地点或工匠的姓名、作坊牌号、监制者的姓氏，以及订制该器的顾主姓名、堂名，或吉祥语、图案标志等，统称款识。

陶瓷款识虽是陶瓷器装饰中的附属物，但由于它是古陶瓷鉴定中的重要环节，故历来为陶瓷鉴定家所重视。通过比较各时代陶瓷器上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方面的特征，再结合造型、纹饰、烧造工艺、胎、釉、彩等其他特征，即可对一件器物进行鉴定。陶瓷器上的款识按其所表达的内容，可大致分为纪年款、室名款、王府款、吉言赞颂款、花样款、供养款、陶人款、仿写款及其他特殊类款等。

纪 年 款

标明陶瓷器制作年代的一种款识。在我国古代陶瓷款识中占有较大比重。一般说来，纪年款可分为三种：一是年款，即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款识，又称朝代款，如北宋瓷器上的“端拱二年”、明代宣德瓷器上的“大明宣德年制”、清代康熙瓷器上的“大清康熙年制”等。二是干支款，指用60年周而复始的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来标明器物具体年代的款识，这种款识多附在帝王年号之后，如宣德时的“大明宣德癸丑年造”、万历时的“万历丁丑年造”等；也有直接用干支纪年的，如弘治时的“壬子年造”、康熙时的“又辛丑年制”等。三是特殊年款，指只写某朝而不写具体年号的款识，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

在历代纪年款中，以明、清时期釉下青花款最为多见，另有刻划款、模印款及以釉上彩书写款等。纪年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线圆圈、双线方框、单线圆圈、单线方框等。也有少数无边栏的。款字多署在器物外底中心，也有署于内底心、口沿下以及肩、腹、耳、柄、颈、足内沿等处的。字体以楷书最为多见，另有篆书、行草等。款字排列方式多为自上而下竖写或自右向左横排。纪年款以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瓷器使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器，尤其是景德镇民窑器上也经常使用。民窑款字体多显得潦草，不及官窑款字体规整。因纪年款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大致年代，所以是古陶瓷断代中最重要的依据。

早期纪年款

指明代以前陶瓷器上的纪年款。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陶器上的纪年款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瓷器上的纪年款首见于三国时期。秦、汉至元代，纪年款日趋多见，落款方式以刻、划为主，另有彩书、墨书和模印等。早期纪年款的特征是：文字内容不统一，落款位置不固定，款字排列无规律，一种纪年款往往只用于某一件器物，不见批量落款。

秦、汉纪年款

秦、汉陶瓷器尚无单独落纪年款的习惯，但有些铭文中的纪年内容，同样起到纪年的作用。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件：

一、山东邹县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一件秦代陶量（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外壁印有篆书秦诏文，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近口沿处印一“驂”字，底部印有两个“驂”字，当是器物制造的地点。此器出土于邹县，与铭文正相吻合。所印诏文，四字一组分两行竖写，缀连成篇，外有边框。铭文大意是：二十六年（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百姓安宁，立皇帝称号，诏令丞相隗状、王绾，把不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统一起来。诏是秦始皇创立的最高法律形式。从其书法风格上看，属于秦小篆，字体方正，笔道圆润，章法和谐，布局合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段文字既是研究秦代统一全国度量衡和文字的重要佐证，也是研习秦篆书法可靠的典范（参见：国家计量总局等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第一版，图版 112）。

二、西北大学历史系藏有 20 世纪 50 年代出土于长安未央乡的署“建元四年长安高”（公元前 137 年）款陶壶（参见：贾麦明

《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陶壶》，《文博》1985年第4期)。

三、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汉新莽时的灰陶狗（参见：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9月第一版，图版11），腹一侧阴刻篆书“天凤六年何亚”铭，“天凤六年”即新莽天凤六年（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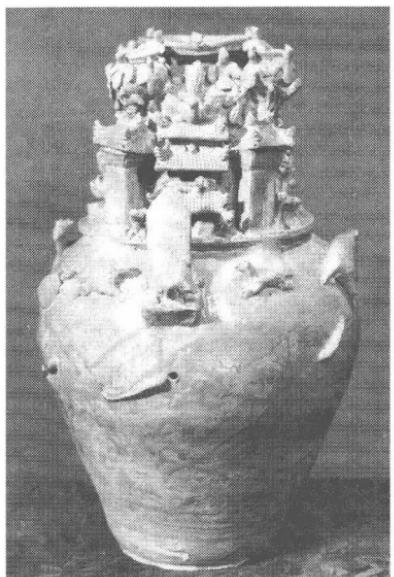
四、1988年湖南湘阴青竹寺汉代窑址堆积层的下层出土了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口月廿五日”（143年）纪年款的陶器残片（参见：李家治、陈显求主编《’89古陶瓷科学技术1，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7月第一版，彩版C5—3），款字是刻划上的。

另外，考古发掘工作中，曾经发现一种东汉时期的镇墓陶瓶，上有朱书镇墓文，内容是为死者解除灾祸的文告，文字开头多记年、月、日。见有“永元四年十二月”（92年）、“永寿二年五月”（156年）、“熹平元年”（172年）、“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193年）等。例如：1957年8月，在西宁市和平门外四号汉墓出土一件朱书陶瓶（参见：陈直遗作《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年第1期），其腹中部以下有朱书十八行铭文，每行三字至十一字不等，共一百三十八字：“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直危。天帝使者，谨为王氏之冢，后死黄母，当归旧阙。兹告丘丞墓柏地下二千石，蒿里君墓。黄墓主墓，故夫人决曹尚书令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隐如故。今后曾财益口，千秋万岁，无有央咎。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冢门。地下死籍削除，文他央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震郭门，如律令。”此器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汉人笔迹，今能见到者，除敦煌、居延等地简牍之外，其他较为多见的则首推朱书陶瓶，其字体多处于由草隶向草书（或隶书向楷书）转变过程中，是研究汉代书法的重要资料。

三国纪年款

迄今所见三国时期陶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出现在越窑瓷器上。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吴墓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虎子腹部刻划“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13字铭文（参见：倪振達等《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另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古



图一

墓出土一件青瓷谷仓，其正面堆塑龟驮碑，碑上刻划“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图一）24字吉祥语（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图版1）。此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20世纪30年代绍兴还出土过一件“吴陶灶”，现已不知下落，灶壁刻有“永安四年十月九日……”等22字（见《金石书画》，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第57期）。1958年，江苏南京清

凉山三国吴墓出土一件青瓷熊灯，在灯的承盘底部刻划“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铭文（参见：《江苏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图12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8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图 055）。甘露元年即公元 265 年。

这几件有确切纪年的器物，大致反映了三国时期瓷器上纪年款的风貌，其特点是：釉下刻划，字体较草率，落款位置不固定，文字内容不统一。

两晋南北朝纪年款

此时陶瓷器上纪年款的风格与三国时相似，无大改变。1976 年 3 月，江苏吴县枫桥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出土的两件青瓷谷仓（参见：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在龟负碑上分别刻有“元康二年润（闰）月十九日超（造）会稽”、“元康出始宁，用此罍，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元康（291—299 年）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元康二年即公元 292 年，但该年并不置闰，元康三年则闰二月，所以碑文中的“润”或“二”字可能有误写。因这件谷仓与“元康三年四月六日”铭文砖同出，故推测元康二年当为元康三年。西晋时带有纪年款的瓷器，还有浙江余姚出土的青瓷谷仓，其龟驮碑上刻有“元康元年八月二日会稽上虞”。浙江平阳敖江出土的青瓷谷仓，其龟驮碑上刻有“元康四年九月九日口州会稽”。

东晋、十六国时期陶器上的纪年款，见有 20 世纪 60 年代敦煌东晋墓出土陶罐腹部墨书“升平十三年闰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张弘妻汜心容盛五谷瓶”（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1974 年第 3 期）。升平十三年为公元 3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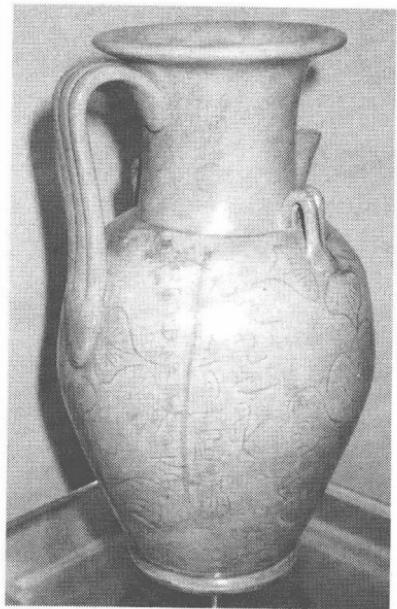
南朝瓷器上见有“大宋癸丑”、“永初年制”等纪年款铭，“大宋癸丑”为公元 473 年，“永初年”为公元 420—422 年。

唐、五代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目

前已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廿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大和年间（827—840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大和八年八月”（参见：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图版164），“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造也”（929年）等。

从窑口上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表一）。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参见：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浙江省德清县秋山乡新农村唐墓出土的德清窑黑瓷粮罂之腹下部刻划“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润州句容县甘塘乡延德里赵金妻任氏粮罂”27字铭文（参见：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图版162）。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直壹千文”（参见：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图版163）。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越窑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于后代无志，故记此罂”（参见：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



图二

期)。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券，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图二)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

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长方形、盘口壶形、钵形或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字数多达二三百字。见有“长庆三年”(823年)

(参见：周丽丽《唐越窑长庆三年姚夫人墓志铭》，《文物》1978年第7期)、“咸通七年”(866年)(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光启三年”(887年)(参见：朱伯谦《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光化三年”(900年)(参见：章钩之《上林湖出土两件唐代刻瓷墓志》，《文物》1988年第12期)、“龙德二年”(922年)(参见：王士伦《余姚窑瓷器探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等纪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两件唐代邛窑瓷碗(参见：刘家琳《两件反映道教内容的邛窑瓷碗》，《文物》1984年第10期)，碗内有釉下彩书写的纪年款及反映道教内容的文字、图像。一件碗心有以褐彩书写的“天宝七载午时造”竖行年款，天宝七年即公元748年；